

郑君里——我党早期著名戏剧电影艺术家

郑君里（1911—1969），原名郑重，又名郑千里，1911年12月6日生于上海，祖籍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平岚村，是著名戏剧电影艺术家。他参加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是“左联”行动纲领起草人之一，曾任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理事、影协上海分会常务理事、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上海市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郑君里的父亲很早就从中山到上海谋生（当时很多广东人在上海虹口天通庵路一带摆水果摊，他是其中一个），靠微薄收入支撑一个家庭。有时到了年关，债主上门逼债，郑君里要替全家跪在堂屋里求债主宽限，一种屈辱感深深埋进了少年郑君里的心里，他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并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郑君里由于家境贫寒，读到初中二年级时毅然中途辍学，考入由田汉先生在上海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戏剧科学习，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田汉先生就是他的启蒙老师。上学时，郑君里在几部戏里跑龙套，如《推销员之死》、《娜拉》等，演艺不断提升，以至于后来担任话剧《大雷雨》的主角。上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开始在上海发展左翼电影，郑君里也由话剧舞台转向电影舞台，出演了《大路》、《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影片，在明星电影公司，他和阮玲玉分别是男、女一号演员。在银幕和舞台上，以形体动作洒脱自如，并善于把握并表达角色的内在情绪，富于艺术魅力而成名。当时电影界有这样的说法：金焰是电影皇帝，郑君里是电影老虎。

郑君里是左翼文艺战线上最早期的中坚分子之一。1930年，郑君里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被选为执行委员，起草《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在文中喊出“敌人若以炸弹攻击我们，我们即以炸弹回报之”的铿锵口号，充满了为革命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那时候做艺人穷，演左翼电影更穷。郑君里曾回忆，他们要时常饿肚子，有时花一个铜板买烧饼油条，就着自来水凑合一顿饭，经常晚上到工厂或学校里演左翼戏剧，演出后又没什么钱，他们一起走回来。后来郑君里拍的《聂耳》里有一场戏：几个人经常晚上出去贴标语，回来后校门已经关闭，他们就从大门跳进去，这实际上是郑君里当年那段生活的写照。

1937年抗战爆发后，郑君里任上海救亡演剧队三队队长，带领队员辗转沪宁铁路各站，溯江而上。武汉失陷后，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到了重庆，之后，在桂林、宁夏、青海、兰州、西康、西昌，在缅甸的密支那、印度加尔各答，都留有他的足迹，出演的《民族万岁》、《野人》等在当时都有很大影响。曾导演过《求婚》、《狂欢之夜》等话剧。后来郑君里在重庆认识周恩来，并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戏剧电影运动做了很多工作。1940年，在重庆加入中国电影制片厂，任新闻影片部主任，历时两年，赴西北、西南地区拍摄各兄弟民族团结抗战的长纪录片《民族万岁》。

1941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在四川成立，其电化教育专修科是后来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当时郑君里受聘在该校任教，讲授电影表演，讲课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深受学生崇拜，他与同学关系也十分亲密。郑君里与章泯合译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的自我修养》，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话剧表演艺术的著作。他讲课的教材，就是这部书，他相信自己的学生会成为中国第一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信徒。郑君里是中国第一个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引进中国的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著作都是俄文，为了准确翻译这本著作，郑君里找来一本英俄互译的字典，通过英语来译俄语，这种难度简直超乎想象。除此之外他还翻译了波里斯拉夫斯基的《演讲六讲》。

郑君里编写的《世界电影艺术史》是一部编年体的世界电影史，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贡献。该书对国外的表演理论进行中国化的总结，这对郑君里后来转做导演是一个很重要的准备期。

1942年，郑君里开始撰写《角色的诞生》，这是中国表演理论的最早著作之一，但是由于战时生活不稳定，他不可能集中时间写作，这部作品直到1946年才完成。

1943年，郑君里参加了中国艺术剧社，导演了《戏剧春秋》、《祖国》等剧。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任昆仑影业公司编导委员会委员。

1947年，与蔡楚生合作编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虽是在老艺术家指导下的电影导演学步之作，却已显露出他作为一名电影导演的非凡的禀赋与才华。翌年，他参加了电影剧本《乌鸦与麻雀》的集体创作，并单独执导了该片，以强烈的使命感和鲜明的时代感，真实地记下了蒋家王朝的“最后罪恶史”。影片在人物刻画、场面调度、镜头处理以至细节运用等方面，都体现出他对电影特性的深刻理解和表现能力。影片于1957年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一等奖。

五十年代后，他的电影导演艺术步入鼎盛时期，影片《宋景诗》（与孙瑜合导）场面宏伟，气势磅礴，反映了当时鲁西农民起义的真实面貌。他执导的《林则徐》和《聂耳》，被誉为“红烧头尾”，是上影向建国10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

1961年，郑君里导演了《枯木逢春》，较好地借鉴了传统艺术的经验，以精雕细刻的手法和富于诗情画意的镜头画面，动人地描述了血吸虫病人苦妹子从绝症中获得新生及一家人在新旧社会的悲欢离合，体现了他在探索民族化的道路上不懈的锐进精神。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由于受到江青等人的迫害，郑君里在监狱受尽磨难，并患上肝癌，而且中晚期，1969年4月23日在上海中山医院病逝。

郑君里在中山市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家乡的人们并没有忘记他。1984年12月，三乡镇政府修建颐老院公园时，专门建了一个六柱四角黄色琉璃瓦攒尖顶的纪念亭，并请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吴作人题写了“君里纪念亭”五个字，以示纪念。2004年，三乡镇开办了一所君里学校，以使他的革命事迹和艺术报国的精神永远鼓舞着青年一代。他与吕文成、萧友梅和阮玲玉并称“艺坛四杰”，他们四人的铜色塑像雕嵌在中山市文化艺术中心内，受人瞩目和敬仰。